

漢賦文學思想源流

簡宗梧

(本文作者為本校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緒論

一、研究漢賦的新嘗試

在中國文學史上，漢賦是相當特殊的文體，它的文學生命早已僵化，有人形容它是艷妝的屍具（註一）。由於它「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容易使人產生鄙惡感；由於它「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文心雕龍練字篇），也容易使人產生疏離感。於是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文體，如今却被擺置在「文學櫥窗」最冷落的一角，不像詩詞曲仍為人所喜愛與「把玩」。它像絕迹已久的禽獸標本，在博物館雖有嚮導人員的粗淺介紹，却很少人肯駐足觀察，即使偶而有人去討論它，却也只是略觸皮相，而難及神貌，更不要說去瞭解它活躍的生命。

本文是一種嘗試，嘗試掌握一些線索，作深入探源和抽絲剝繭的工作（註二），以它的背景資料，從事生態的研究，探討它的筋骨血脉，從而了解它生命的奧秘、活力的泉源，以及它孕育、茁壯與老化的過程。如果從每一條線索，去考察它的起源、特性與歷史，而使漢賦所有的現象，都得到適當而有條理的解釋，那樣才算接近了解漢賦的本質。

文心雕龍原道篇所謂「心生而道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神思篇所謂：「意授於思，言授於意。」都說明先由思想而產生意象，由意象而運用語言，於是有了文章。而英國文學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也認為「文學是思想的表現」，所以從一代文學思想的源流，去考察一代文學作品的形成、特質和流變，應該是一條值得尋繹的線索。換句話說：就兩漢時代的文學思想，尤其對辭賦的看法，作歷史的研究，追溯漢賦的起源，了解它的背景和特性，再就其觀念改變的軌跡，尋究其演化的現象和原因，應該是研究漢賦值得嘗試的途徑。

二、漢人對辭賦價值的評估

漢人對辭賦價值的評估，最具有代表性的，應該首推漢書王褒傳：

上令褒與張子儔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這一段不但代表了漢宣帝的文學觀，也未嘗不可以代表班固對於辭賦的總批評，甚至代表漢代的辭賦觀念（註三）。其中不但評定了文學的遊戲意義，還認定了諷諭的效用，以攀附於漢儒所公認的古詩價值。賦家揚雄之所以較不爲賦，也是從遊戲性質的認定（註四），以及對諷諭效果的懷疑所致。在漢書揚雄列傳，就自己說：「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閑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較不復爲。」

可見漢賦的遊戲意義和諷諭價值，是漢代評估辭賦的兩個核心，也是體認漢賦最重要的兩個文學觀念。當然，也造成漢賦尚文欲麗的傾向，與尚用諷諭的要求。而二者比重的調整與修正，就是兩漢辭賦文學觀演變的主要歷程。

貳、漢賦遊戲說的由來

我們要探討漢賦價值觀的由來，應當先瞭解漢賦的興起，因爲由它興起的背景，才能考察出它原先的本質，也才可以知道價值觀建立的依據。

一、從梁園賓客的盛況，推知漢賦文學遊戲的本質

漢賦初盛於景帝時梁孝王的梁園，據西京雜記（卷三）記載：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旣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嚮，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

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贊蹠，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盤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錙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謬。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註五）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十。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羽羽。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曠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湘綺，文如素蒸；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昧。皆麰渾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醡醡，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甕既啓，且筐且漚，載茵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涿鄴，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繁停，凝醡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盤覆觴；右曰官申，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吳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註六）

公孫乘爲月賦。其詞曰：「月出皎兮，君子之光。鵠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旣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躊躇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註六）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翰匝（註七），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顥顥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紝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蘂，攀喬

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礪。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秀麗，似龍蟠馬廻，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四。

由於這些賦文見於西京雜記，而不是漢人的總集，所以它的可靠性，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不過史記梁孝王世家也可以證實梁王的豪奢（註八），而司馬相如列傳、以及漢書賈鄒枚路列傳，與其所謂「梁客皆善屬辭賦」，都可看出梁園文學侍從之盛。同時鄒陽傳還說：「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和枚乘，都還曾上書諫吳王，而羊勝、公孫詭，還是爲梁王刺殺袁盎及議臣的主謀者（註九），他們於梁王聽政餘暇，在忘憂館作賦取樂，罰酒賜絹，本來就是主上與游士謀臣之間休閒遊戲的性質，也就難怪以後的人，常將它與博奕相提並論了。

二、從言語侍從的由來，探討文學遊戲意義的由來

在梁孝王死後，梁園賓客也都四散了，像司馬相如還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後來由於漢武帝頗好此道，所以辭賦爲之大興。枚乘還受到「安車蒲輪」的徵召，雖然沒有享受到富貴，但其子枚皋終能克紹箕裘。司馬相如更是風光體面。然而這些人在班固兩都賦序都稱爲言語侍從之臣。我們如果去考察一下那些言語侍從之臣的由來，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身分與權責，原不過是幫閒之流，也就難怪像揚雄所說：「頗似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漢書揚雄傳）了。

禮記禮運篇，說「王前筮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巫是參贊決策的參謀，藉神以自重，史則記言記事，都是政治上的助手。至於卜筮瞽侑大體上都是幫閒人物，也難怪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文史星曆，迨於卜祝，主上所戲弄，而流俗所輕。」瞽是樂師，侑可能是談優一類的人物（註一〇），是屬於娛樂耳目的近嬖弄臣。這些人是否就是後來所謂的言語侍從，固然不能完全確認，但由於王綱解紐，陵夷至戰國，有些諸侯侈逾王室，他們身邊就有談客談優（註一一）。這些近嬖佞臣，或侯門清客，原先像淳于髡、優孟之流，還只限於口耳傳達，沒有寫成文字，不過淳于髡對威王問的一段，却極有賦意。

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帶韁靉臙，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闈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鄒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

齊玉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史記滑稽列傳）

也許是這些談片的記錄，出於名家手筆，所以極像辭賦。不過用它和後來「宋玉對楚王問」、「司馬相如對梁王問」比起來，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它們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大體說來，遇到愛好這一些作品的王侯，在近侍之中，羅致一些「能文」之士，由於王侯與侍從之間，趣味相投，於是就有篇章傳世。楚襄王宮廷的侍從，或許可以說是這種轉變最具代表性的事例。

楚襄王李橫，在即位之前，曾到秦齊充當人質，那時齊國稷下文風鼎盛，他是不是受到濡染，雖然不能確定，但即位後有大夫宋玉、景差、唐勒，經常與之遊處，而留下篇章，已可見其趣味之所在。這種伺候王侯、投其所好而寫辭賦的風氣，由秦到漢，除秦人雜賦和陸賈、孟春之外，吳王濞及梁王武的侍從枚乘、鄒陽，以至武帝身邊的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以及往後的王褒、楊雄，都是同一路數。

在班固兩都賦序，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同列爲言語侍從之臣。東方朔在褚少孫所補的史記，就與淳于髡、優孟、優旃同列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說：「朔嘗至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詆啁而已。」而枚皋傳也說：「皋不通經術，詆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黠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得尊官。」都類似侏儒俳優一流的人物，所以嚴助傳說：「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蓄之。」固然，所謂言語侍從的辭賦

作家，其中也有人立了一番事功，而淳于髡請趙兵救齊，也是可與他們相比擬。

我們如果推溯得更早一點，擬之於孔門四科，他們與縱橫家應該同出於言語一科。劉師培論文雜記說：

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雖體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西漢詩賦，見於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並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爲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

而文心雕龍時序篇，也說：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麤駭。方是時也……（略）……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置雅頌。故知曇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這些言語侍從，既是說客談士俳優之流，而縱橫家之士，在統一的朝代，就不免有擾國亂民之患，自秦始皇三十四年接受李斯的建議，力加裁抑（請見次章第二節），迨主上愛好辭賦，由於利祿之所在，他們也不得不棄其宗尚，改絃易轍，從事辭章，以投君王之所好。他們的作品也就侈陳形勢，將以前聳動君王的政論權術，改爲聳動君王的文辭鋪排，以娛其耳目，也就難怪它遊戲成分如此濃厚，所以它的遊戲意義，可以說其來有自。

三、從繁盛於宮廷，說明漢賦遊戲性質的需要

漢賦是繁盛於宮廷的文學，是侯門清客文學侍從，跟愛好文學的帝王諸侯，在遊處應對時的作品。所以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稱它爲貴遊文學。班固兩都賦序說：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

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蓋由此可以看出漢廷辭賦的盛況，也由此可知：因為政治安定，社會繁榮，生活豪奢，他們需要謳歌各種享用及禮儀的篇章，以宣揚君王的威德；也需要鋪張揚厲的描述，以滿足他們驕縱狂放的情感。這些都不是經史諸子所能提供的。他們於聽政之餘，需要比附風雅，馳騁情懷的篇章。這些御用的言語侍從，就是這類作品的提供人，漢賦就是他們供以娛悅耳目的篇章。

參、漢賦諷諫說的起源

漢賦既然是昌盛於宮廷，作為閒暇之餘遊戲消遣之資，它為什麼又牽涉到嚴肅的諷諭效用，而又成為評論漢賦的中心問題？這自然也有它的背景。

一、出於漢賦作家的職分

由於辭賦是特殊的宮廷文學，漢賦的專業作家，稱之為言語侍從，他們的職分，就是「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這是班固兩都賦序所明言的。就以揚雄所羞於比倫的淳于髡、優孟之徒來說吧！前章所引頗似辭賦的一段，便是淳于髡用以諷諫齊威王罷其長夜之飲，這在史記滑稽列傳已寫得很清楚，另外在田完列傳也寫到他隱諭「國中有大鳥，止之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以諷諫齊威王，得以救齊於危亡，可見他是諷諭的能手，也以勸諫為己任。再如優孟，雖是樂人，但史記說他「多辯，常以談笑諷諫」，他諫楚莊王葬馬，諷莊王撫恤孫叔敖之後裔，都可以看出他的確是諷諫的高才，也惟有以諷諫之術，奉獻其心力，造福其邦國。樂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士子的言語侍從，豈能在言辭之中加上一些嚴肅的主題寓意？

我們再看看漢賦早期的作家，那些在梁園的賓客吧！鄒陽早期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

其意。」與其諫書都見於漢書本傳，可見他是致力於規補主上之過。另外，枚乘除在吳王陰謀蓄反的時候上書諫諫之外，當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以誅鼂錯爲名，而漢廷斬鼂錯以謝諸侯之後，枚乘再度上書以說吳王，只是吳王不納，但他也由此而有聲名。景帝召他官拜弘農都尉，只是枚「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見漢書枚乘傳）可見他還是喜歡做侯門清客，做諷諫勸納的事。

同在梁園，後來爲武帝見寵的司馬相如，除了以辭賦諭諫之外，還因漢武帝喜歡自擊熊彘，馳逐野獸，而有諫獵書之作，前以禍恐之，後以道諭之，倪思以爲「千賦不及此疏」，可見評價之高。

同屬於武帝之時，列名於兩都賦序的言語侍從之臣，另外還有虞丘壽王和東方朔，他們也都有諫諫的記錄。如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即收有虞丘壽王的禁民挾弓弩對；東方朔的諫除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對，都可以看見他們的進言。

遠從戰國之期的侯門清客，本來就已經是主上的參贊策畫人員，爲主上分勞解憂，一方面是爲報答知遇之恩，另方面也是爲使自己的靠山長久不墮。他們畢竟是士子，都學會一套諭諫諷諭的本事。後來的這些言語侍從之臣，就是那些清客游士的化身。由於傳統職責之所在，必要時固然可以上書力諫；如果在適處應對之時，求得微言感悟，寓規諷於歌頌吟咏之中，豈不是皆大歡喜？所以奏御之辭賦，也就滲入了諭諫的成分，而如何娛悅耳目又寓諷規諫，也該是他們需要講究的技巧。

二、受到評析詩騷充斥諷諭的影響

班固兩都賦序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又說是「雅頌之亞」，可見漢人心目中，它與三百篇的關係。文心雕龍詮賦篇也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僅就其流變而言，三百篇而楚辭而漢賦，本來就是純文學的脈流。漢宣帝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而他所說「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也顯然是本之於孔子所說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來。因此，有關漢人對三百篇的文學觀，勢必影響對漢賦的要求，這是很明顯的。（詳見次章）

從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開始，其後詩人便以「思無邪」爲奉守之準則，讀者「以意逆志」，也以

「思無邪」之意逆溯詩人之志，而以禮義爲依歸，卽詩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論語八佾篇：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從「繪事後素」而連想到「禮後」，孔子稱許他可以言詩。另外在學而篇，也贊許子貢可以言詩：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可見孔子以爲能準之以禮義的聯想，才可以言詩。漢人言三百篇就是走孔門詩說的路子，只是先秦學者，多斷章取義，以詩爲己意的註脚，如子貢引之以說精益求精之意、左傳賦詩專對、及引詩以評人事，率皆如此(註一二)；秦餘學者，却以己意作爲詩的註解，以自己無邪之思、合乎禮義之意，逆溯詩人之志，卽將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萬章上）加以充分的運用。於是居三百篇之首的「關雎」，魯詩之說，依漢書杜欽上疏所言，是在周康王的時候，夫人於鶴鳴之時就佩鳴玉而去君所，否則就會晏出，於是詩人歌而傷之。齊詩之說，依漢書匡衡上疏所說，是「欲使后夫人之德，侔天地，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是正匹配之時的詩。韓詩之說，則以爲那時候一般從政者，都傾於女色，賢人傷之，於是詠關雎以正淑女之容儀，所以是刺時之作（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毛詩之說，則以爲此篇是說后妃之德的，說是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文王時代的詩（詩序）。顯然所說的詩旨和作詩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不過以無邪之思，以禮義之意，牽扯政治諷諭，以逆溯詩人之志，却是相同的。而說它欲以淑女配君子，也是一樣的。其間還有差異更大的，如後人多解析爲男女期會之詩(註一三)的邶風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其娈，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憚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女之貽。

依毛傳及詩序，認爲它是刺時之作。是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的詩，而以「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關於韓詩，見

於韓詩外傳，說：「一賢者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略）……搔首踟蹰』。」魯詩見於說苑辨物篇：「賢者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略）……搔首踟蹰。』」可見魯韓二家，是把它當作賢者窮於仕途，嘆老邁而待知己的詩歌。至於齊詩，依易林師之同人：「季姬踟蹰，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而同人之隨：「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屋無憂。」又大有之隨：「躡躅踟蹰，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我齊侯。」陳喬樞齊詩遺說攷，便說：「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林所云季姬，卽指少衛姬。戴氏震云：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故詩云俟于城隅。」各家解析，相去很遠，可見漢人論詩，各以己意，強加附會，不過還是不外乎依禮義而行其美刺，更牽扯政治諷諭不遺其力。

漢人對楚騷的看法，也是如此。太史公自序就說：「作辭以風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而班固離騷贊序，也說：

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也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意。」王逸的楚辭章句敍，也說：「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又說離騷是「獨依道德，以諷諫君也」（離騷經序）；九歌乃「上陳事神之敬，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九歌序）；九章爲「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則「外崇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招魂序），全是諷諫之作。

漢人既以爲「不歌而誦謂之賦」，就類似於「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所以作賦論賦，也就取漢人所認定的「主文而謠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序）的古詩遺意，以爲賦篇的立意主題。換句話說：漢人以爲辭賦是古詩之流亞，又

以楚辭爲其正宗；而他們認爲古詩創作與楚騷之立義，都是以諷諭爲主旨，於是他們的賦篇也以諷諭爲宗，那是天經地義的事，那麼他們論賦，也就以諷諭爲其中心議題了。

三、受政治左右文學發展的影響

文學思想受時代環境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西洋文學發展與社會經濟息息相關，而我國的文學發展，却與政治的關係特別密切。推究其原因，這可以說與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有關。孔門四科就大多跟政治有關，而孔子又說：「學而優則仕」，於是歷來讀書人多以仕途爲天經地義的出路。錢穆先生就說：從漢武帝爲博士設弟子員，「自此漸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任廩與貲選，士人政府由此造成」（國史大綱一〇二頁），文人參政，自然使它的關係趨於密切。不過，政治力量左右文學發展，却是在此之前。

據史記始皇本紀，在西元前二二三年，也是秦始皇在位第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建議再行封建諸侯以屏藩秦室，但丞相李斯極力反對。他反對的理由之一，是怕「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本來這是提倡文化，應該沒有害處，不過李斯的看法，並不是如此。他說：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謠。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戰國時學派分歧，相互攻訐，固然是諸侯並立，厚招游學，各憑仗其政治庇護，所以敢如此；但另外還因爲累積的詩書百家語太多，理論繁雜，所以李斯除了反對封建之外，還提出積極的建言。他說：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

爲師。

由於秦始皇的批准，於是有了焚書與學術思想的禁制，到漢惠帝四年才除挾書律。但經過這次的禁制，百家爭鳴的時代，就此成爲過去。似乎任何學術思想都被收攏在統治者的意志之下，尋求其外衣爲其保護色。漢初統治者好黃老之術，則所有的學術便囊括在黃老的名義下生存，帝王喜愛老子，文人言論必引老子以自重。轅固生只說老子書「此是家人言耳」，就被竇太后派入豕圈刺豕，假使沒有景帝給他利兵，恐怕都會被豬咬死；而魏其失寵、田蚡免職、趙綰、王臧自殺，都跟貶道家有關（註一四）。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陰陽雜家之說，也都以孔子爲其護身符，緯書就是這種情形下的依託之作。

辭賦極盛於武帝定儒術於一尊之後，因此，言語侍從更不能例外，更需要披上儒家的外衣，攀附儒家解析古詩所強調的價值，大行其美刺。因爲三百篇是儒家所崇拜的經籍，所以賦家寫作，即使以求寵爲目的，也要亦步亦趨的，以聖賢之道諷時人之得失了。

肆、漢賦文學思想與儒家文學觀

一、漢賦文學價值觀與孔子詩說

漢賦諷諭說的闡發，固然得之於孔門的詩教，如果牽扯得遠一點，其遊戲說的認定，也未嘗不是得力於孔子的詩說。漢初樂園作賦取樂，未嘗不可以說是本之於孔子所謂的詩「可以羣」。其可以羣的羣居相切磋，是有煮酒論詩、以文會友的意思，也就是鍾嵘詩品所謂「嘉會寄詩以覩」的意味。如果說漢賦的遊戲說，得自於孔子詩說，或許不免過於牽強；但漢賦的遊戲價值，在獨崇儒術的環境下，它的價值地位，由尊奉孔子詩說而認定，那是不成問題的。

孔子提到詩的功用是多方面的：

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論語陽貨）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

可見孔子認爲詩的功用，實在極爲廣大，諸如德性涵泳、考見風俗、嘉會以親、抒發情志、博物多識、甚至事親交友、政治外交，幾乎無所不包，無不可以致其用，所以提供後人鑒附的依據，也就多方面了。

孔子之所以說：「不學詩，無以言」，並且以爲有「專對」之用，自然有漢書藝文志詩賦所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的背景，到了「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這些辭賦自然失去四方專對的功用，但其他的作用多少還可以鑒附。漢宣帝以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而「小者辯麗可喜，譬如……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就完全依附孔子詩說而推論的。換句話說：辭賦玩悅遊戲的價值，和諷諭的功用，都從孔子詩說得到它的理論依據，而確認了它的價值。

二、漢賦尚辭與孔門文學觀

文心雕龍誼賦篇說：「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與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雜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劉勰所說立賦之大體，正有孔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義。當然，文心雕龍又說：「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詭於霧縠者也。」揚子雲還說：「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顯然都認爲漢賦尚辭而寡用，似乎不合文質彬彬的要求。

不過我們如果考察一下孔門的文學思想，雖然提出文質並用的主張，但在先秦百家之中，其立場畢竟是偏向於尚文尚辭的一面，只不過是當時有關文學本質的討論，却不大稱「文」，而只是在論「言」論「辭」時提及。

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以此推論，有德無德皆有言，而有德與否，是對言的基本分類。「德」是個人的修養，那麼孔子認爲言語的修養，也是君子修養訓練的項目之一。曾子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篇）這三方面的修養，「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可作為孔子所謂有德之言的註解。倍者、悖也。這是指君子說的話，沒有鄙陋悖理之言。因此可以推知：有德之言是要求說話有知識不悖理，還要不鄙陋的說出來，這正和「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篇孔子之言）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孔子雖然主張文質彬彬等量齊觀，但從「語言加工」（不鄙陋）的觀點看來，就有傾向於尚辭尚文的意味。

「遠鄙倍」不是空泛的標準，而有方法可以致之，學詩應該是它基本的修養，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與觀羣怨是詩本身的功能，藉此專對以事君父，才是「出辭氣」的極致；而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出辭氣遠鄙倍的途徑。詩人借鳥獸草木，托出自己的情意，更因為詩是委婉含蓄的，不能像散文那麼直質，不能不借用辭藻來烘托，所以禮記學記也說：「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康成注：「博依，廣譬喻也。」博依也就是豐富的辭彙知識。董仲舒也說：「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更是表明詩之所以能感人，就因為這些豐富而有趣的材料，因此學詩之後，可以出辭氣遠鄙倍，出有德之言。

因此孔門儒家的文學觀，從所謂君子貴乎道者三，要求「出辭氣，遠鄙倍」，是傾向尚文尚辭的一面。也因此在四科中有「文學」一科。「出辭氣，遠鄙倍」，是傾向尚文尚辭的一面。也因此在四科中有王之詩書爲教材，文學一科即長於此道。就言語來說，以先王的言語爲規範，合乎典故，得以不悖理，得以不鄙陋，而爲有德之言，非齊東野語，這正是文與質的歧點。

論語顏淵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韓，猶犬羊之韓。』」表面上看來，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似乎是主張文質不分，但「虎豹之韓，猶豹與犬羊無異，文之重要由此可見。言語只是表達的工具，但有有德與無德之別，這個德是言語的修養，也是表現於外的文，有德是讀過聖王典籍，受其沐浴，而遠鄙倍的表現。換句話說，那些言語是經過訓練加工的。重視語言加工，順此發展，也就引發對文辭修飾的重視與寫作技巧的講求。而孔門四科還有言語一科，以及孔子所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也未嘗不可以作爲尚文尚辭傾向的旁證。而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語：「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

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可說明尚文的傾向。

漢賦的「鋪采摛文」，是「遠鄙倍」和「言之有文」淋漓盡致的表現；其「極聲貌以窮文」，正是「博依」的發揮。如果董仲舒所說：「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也是代表儒家文學觀的話，那麼漢賦無疑是儒家文學觀的發揚蹈厲者。

三、辨賦家之於縱橫與儒家：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

古者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對問，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敍輯之義也。

章氏大體就其辭賦的外在形式來說的，就文學觀來說，並不相得。莊子天道篇所謂：「世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如果賦家承其思想，就不會鋪張厲、盡態極妍了。所貴之意不可言傳，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那還有什麼好說好寫的？所謂「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齊物論），語言既然有其不定性，其效用有限，於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所以「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齊物論），那麼辭賦瓊詞麗句，可以休矣！

辭賦的文學觀也不會得自韓非。其外儲說所謂「傳先王之道，論先王之言，以教後代，若辯其詞，則恐人懷其文而忘其質。」而辭賦懷文求美，與它背道而馳。呂覽雜家，那就更不用說了。

至於縱橫家與賦家，關係似乎比較密切。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辭賦「障輝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這已在第二章引過，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說：「縱橫家者，賦之本也。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毛萇曰：奉下親上曰胥附），折衝於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繩結，誠文辨之雋也。」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譖而棄其信。」劉

申叔論文雜記也說考賦家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所以說縱橫原出孔門言語一科，任行人之職，但「邪人爲之，則上詐謾而棄其信」，如蘇秦、張儀都着力於揣摹利害的機心，反復辯論，煩碎而放恣，不出於誠心，不本於道義，而自留意仁義的儒家歧出，另立門戶。他們專事揣摹利害機心，以巧辭炫人，賣弄自己以取悅於人，本身也談不上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在漢一統的局面下，由於遊說已無所施爲，於是改其崇尚，移其鋪張言辭與託諷的心力，轉而用於雕章琢句，歌頌太平盛世，以博帝王歡寵，以爲干祿進身之階，漢賦也就因得縱橫的鋪張揚厲而蔚爲大觀（註一五），賦家與縱橫之關係，由此可見。他們一直努力於言辭加工修飾，本來就是走儒家的路子。只是他們加工過甚，如荀子所說：「亂世之政，其言匿而采」，以至掩乎其質，而令人有買櫝還珠之惑。

當然，縱橫家之煩碎放恣、巧辭炫人，以及賦家之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原非儒家對文學的真正要求，所以他們的缺失，自然算不到孔門文學觀的賬下。不過他們對文學的基本觀念和立場傾向，本之於孔門儒家，倒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漢賦極盛於獨尊儒術之後，賦家更需要借重儒家思想以自重，所以連賦中所表露的思想主張，也都披上濃厚的儒家色彩。

伍、漢賦文學思想流變

文學思想與理論，是文學創作的南針、文學批評的準則。它領導創作，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什麼觀念下產生什麼作品，同時也可以由作家的作品，了解他思想的梗概，因此，我們不但要在賦家的書札或言論中，尋求他的主張，更要從其作品去尋繹他們的思想觀念。

不過本文以漢賦爲研究主體，因此，探討文學思想也以與漢賦有關者爲限，所以像王充，他是東漢的大思想家，論衡是探討當代的思想觀念，也探討到文學的思想觀念，也涉及尚文與尚用的問題，但他探討的是集札之文，討論的是論說文，與詩歌賦篇無涉，本文也就從略了。

我們觀察漢代辭賦思想，可說尚文尚用各曾偏勝，也可以說：遊戲說和諷諭說兩個漢賦文學思想核心，曾相互的消長，大體可分爲以下三個階段：

一、以遊戲為衣表，以諷諭為骨裏的尚文傾向

漢賦初興於吳王王府與梁王菟園，大盛於武宣的宮廷。正如班固兩都賦序所說的，這些言語侍從，「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但王侯皇帝則視辭賦為聽政之餘閒，娛樂耳目的遊戲，所以梁王為之以賜絹罰酒，武帝頗以「俳優蓄之」，宣帝則比之以博奕。不過賦家本身，基於職責本分，以及學養與理念，在遊戲消遣之外，鋪張揚厲之後，輸之以諷諭，所謂終歸於亂、曲終奏雅。他們投帝王之所好，而寓以規意，如程大昌所說的：「夫旣先出以勸，以中帝欲，待其樂聽，而後徐加諷諭。」（註一六）我們就舉此期最具代表性的司馬相如，並舉其見於本傳的賦篇來說吧！

子虛上林賦之寫田獵，正是投梁王及武帝之所好。史記梁孝王世家，說梁王「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相如在梁寫子虛賦，就有極強烈的規諫之意，所以他不寫梁而稱楚，並藉烏有先生之口，斥子虛的不是。由於子虛盛鋪楚王之狩獵，烏有先生就說：「……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言之，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蓋以田獵之豪奢，爲淫樂侈靡，爲國君之惡，這諷諭還不明顯嗎？烏有先生還說：「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更是直言破的。若不是設楚使與齊人之對話，這些話是不能向梁王說的，這種投梁王所好，借遊戲之言表，藏諷諭於骨裏的手法，是何其詼諺高妙。

武帝更是好獵的天子，漢書東方朔傳就說武帝於建元三年「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驅禾稼稻杭之地。」像他這樣冒名狩獵，又如此恣放的君主，還不會多見。上林賦藉天子的自覺以收諷諫的效果，他是這樣寫的：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廼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填壘，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

他首先爲天子狩獵，找到最好的理由，所謂「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但不能毫無顧忌，因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行孟子所謂與民同樂之仁政，提出一套漢儒的政治理想，藉命有司而行其諷諫。

臺靜農先生更認爲：司馬相如之所以選田獵爲題材，是因爲戰國以還，王侯苑囿漸大，正如孟子所說的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王侯與民爭地，民不聊生，相如特作子虛上林以諫（註一七）。這麼說來，上林賦之作正當建上林苑之當時或稍後（註一八），而這塊相如宦途的敲門甞，可也是爲生靈百姓請命的萬言書了。

哀二世賦指秦二世持身不謹、信讒不寤，這是聲東擊西的諷諫手法；而亡國失勢，宗廟滅絕，可爲殷鑒，略略數語，只是點到爲止，朱子楚辭後語說：「此篇所爲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徊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過徐孚遠則以爲「此賦奏之，天子不以觸忌爲忤，君臣交有其美也。」（註一九）此賦所哀者，爲前朝帝王，是漢高祖所聲討的對象，豈能傾意極言？再說要傾意極言，也不用辭賦體，而也不再是諷諫了。相如之作，一向是以遊戲爲衣表，以諷諫爲骨裏的。

另外大人賦的諷諫，雖爲揚雄所批評，但其諷諫意義之所存，是一致公認的。相如稱武帝爲中州之大人，其訪仙時，威儀之顯赫，氣勢之逼人，簡直是征服者的姿態。寫到神仙之最——西王母，「皤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神仙生活如此蕭瑟落寞，不足羨慕，暗示何其強烈！但武帝之所以讀後反而「飄飄有凌雲遊天地之間意」，那是因爲他藉長卿靈動的筆鋒、豐富的想像，陶醉於賦中奇妙的構想、磅礴的氣勢，而無視於諷諫，就像小孩喜歡故事，爲其引人入勝的情節所吸引，甚或自擬爲故事的主角，而對故事的諷世寓意，並不關切而已。

本來武帝的愛好辭賦，就是作爲餘閒遊戲之資；言語侍從本來就如同幫閒者流，所以類於俳優，投主上之所好，是先決條件。但他們處心積慮，要在遊戲之中，深寓規諫之意。就像一個食品營養專家，首先要遷就人們的口味，然後挖空心思，調製美味可口又營養豐富的食補佳餚。投合口欲是先決條件，否則不願入口，一切設計終歸無用。因此這個階段的賦，尚文尚辭是它顯著的傾向。司馬相如所謂「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

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註二〇）可見他對文章構架和辭藻運用的苦心，真是慎重纂組，密密編織，不但「列錦繡」目視之以爲美，還要「一宮一商」耳聞之以爲美。這種尚文求美、尚辭好藻是很顯然的。

到宣帝之世，從漢書王褒傳看來，頗似於武帝之際。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所謂「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詛信若彭祖，尚嘘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而王褒傳還說「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諷諭之意顯然。但出於作者之口，已有化暗爲明的傾向，開轉變之先聲。然而宣帝稱「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又說「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對漢賦的遊戲與諷諭相提並論，又以諷諭爲大者，是把諷諭的作用大大強化，建立了鞏固的地位。

二、以諷諫爲主幹，以遊戲爲附葉的尚用扭轉

由於辭賦成爲漢代文學的主流，被認爲是古詩之流，也是雅頌之亞；而三百篇又被解釋爲諷諭之作，於是漢賦諷諫之用，被極力強調。所以他們認爲「文麗用寡」（註二一），如「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揚雄本傳），舉凡文辭太佳，使人「覽其文而忘其用」，大大削減了賦的價值。他們直以爲諷諭之用，才是賦篇真正價值之所在。換句話說，諷諭是賦的主體，遊戲是花葉末事，不能讓繁華損其枝幹主體。這種尚用的扭轉，揚雄是最顯著的代表。

揚雄在早年，因「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所以在賦的體貌和精神，都和相如相似，楊慎就說：「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註二二），羽獵賦寓諷於頌，是規撫上林賦的「解酒寵獵」一段，而河東賦之作，本傳說：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旣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
岳，述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

揚雄獻河東賦，看來與相如作哀二世賦的動機相似，只是相如藉哀二世之行失，隱含勸諫鑑戒之意；揚雄是藉着歌頌漢德，指陳自興至治之道，又如姚鼐所說：「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藝之囿、及翱翔書圃之語。此文法之，借行游爲喻，言以天道爲

車馬，以六經爲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歷山川以爲觀覽乎？」則又是取上林諷諫之手法。不過我們可以感覺得到，揚雄的諷諫比相如急切多了，而且陳古以喻今，以及寓諷於頌，都是漢人解析三百篇最慣用的手法，所以他賦中諷諫，已十分明朗化，已減少所謂「謗」的成分。如甘泉賦之作也，自傳就說：

甘泉本因秦離宮，旣奢泰，而武帝復增……（略）……遊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爲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薰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虧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可見他在短短的一千三百字的賦篇，灌入了不同的諷諫主題，賦文幾乎完全爲諷諫刻意安排，並以此自得。不過這些諷諫的內容，多透過作者的口述，使它躍然紙上；而不像相如用天子的自覺或第三者深隱玄機的對話來表達。長楊賦是用設置問對的手法，正如義門讀書記所說：「客卿之談，正論也；主人之言，微辭也。正論多忤，微辭易入，所以爲諷。借客卿口中入正論，此正妙於諷諫處。」但仍就此事而論此事，不像子虛賦說楚以喻梁，那種聲東擊西的手法。

從揚雄賦篇，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對諷諫的效用，有着更強烈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似乎還是落空了。王充論衡遺告篇說：「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於是他有「賦勸不止，明矣」（本傳自述，下同）的感悟，又感到「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輒不復爲。」接着，他在法言吾子篇提出強烈的尙用主張。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這強烈的尙用要求，應用在辭賦的批評上，還說「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溷法度也。」不過此後的辭賦，其寫

物圖貌，蔚似雕畫，却還依然如故，甚至猶有過之。只不過是在觀念上，認爲那些是繁華綠葉，而諷諭之用才是不可或缺的主體。諷諫表面化了，他們完完全全爲諷諫而寫賦，還老掛在口頭上，加重了諷諭價值的比重。

這時的賦家，已不再像前面所比喻營養專家，那種食補的策畫者，倒是像長於藥補的醫療人員，固然他們也爲了吞服方便，外表加了五顏六色的糖衣，但他們所關切的，是什麼情況該用什麼藥，以及用量與時間的調配。已不再是諫之於遊戲之中，而是很嚴肅的把它當作上書規勸的一種形式。所以在他們眼裏，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甚至揚雄早年的賦，都是「競爲侈麗閑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

東漢賦篇的諷諫，大多很明朗，也就難怪楊慎說戰國諷諫之妙，只有揚馬得之了。這時爲了避免「覽其文而忘其用」，已表面化的諷諫，仍然怕被忽略，於是在賦序就把主題明確的加以註明（註二三），如班固兩都賦序說「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賦的尙用如此講求，那簡直就成了應用文的寫作，帝王對它的興趣，不免爲之銳減。武宣之後，言語侍從的沒落，就可能受到辭賦講求尙用的影響。

三、尚文觀念的迴瀾，與遊戲性質的轉濃

由於班固的尙用觀念，注重諷諫之義，於是對屈原有所批評，他的離騷序說：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譖。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對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在」，是從尙用的立場來批評的。說他「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堪稱「妙才」，是從文辭的

藝術立論的。就整體而言，是偏重於諷諭尚用的一面。但王逸的楚辭章句敍，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班固謂……（略）……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這也是從尚用的立場，儒家論詩諷諫的觀點來說的，他比之大雅，說屈原猶且婉順得多，然後他又舉離騷文，合五經立義者，共舉五例（文長不列舉），最後又說：

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這可完全從尚文愛美的觀點，來贊頌屈原的作品。羅根澤說：「這一則由於班固雖小好辭賦，王逸則是純粹的辭人。二則尚用的觀念，與兩漢相終始，王逸東漢之末，尚用觀念已逐漸薄弱，愛美觀念又逐漸孳長。惟其如此，所以王逸雖亦以尚用的觀點評論屈原，而更以愛美的觀點贊頌屈原的作品。」（註二四）其實王逸之所以以尚用觀點來評論，是針對班固的論點而發，他還是偏向於尚文的一面，所以可說是尚文觀念的廻瀾。

到了曹丕，這傾向更趨於明顯，北堂書鈔卷一百引：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曹丕云：「優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麗，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設譬，其意周旋，綽有餘矣；長卿、子雲，意未及也。」

就已完全站在純藝術美的觀點，評論技巧的工拙，再也不提尚用的諷諫問題了。

如果從作品的本身來說，由於奏御之賦日多，後代之賦有意與前人競爽，務求駕乎其上。如張衡的二京，擬班固的兩都，爲了不剽襲而力求新意，就不得不逐句琢磨，逐節鍛鍊，鋪敍誇張，變本加厲。即如都市商賈、俠士、辯士的活動，還有雜技、

角觝、百戲的演出情況，一切新事務都力加描寫，這種文辭力求凌駕前修的精神，自然使人走上尚辭的傾向。加以張衡、蔡邕等巨匠，都崇盛麗辭（註二五），駢偶之風漸盛，於是尚文廻瀾疊起。以至獻帝及曹魏之際，由於曹操的多才多藝，加以諸公子好客，他們與文士（註二六）行連輿、止接席，朝夕相從，可以說未嘗須臾相失於詩賦樽酒之間、弄姿絲竹之裏，所以當時鄴下文章，盛於天下，而詠物賦之大盛，都顯現出遊戲性質的重新擡頭，於是也就更強化了尚文尚辭觀念的廻瀾，甚至形成主流了。

陸 結 語

以上是從文學批評的觀點，分析漢賦的源流。先從漢人對辭賦的評論，探討其批評理論的基礎和批評的立場，並追溯其由來，了解其背景，然後再窮究這些文學理論對作品造成影響。對於漢賦源流的尋繹，本文已提供了一些線索，而對漢賦若干現象，也提出合理的解釋，並建立了有條理的體系。相信將有助於漢賦的了解，也將有助於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建立。

註 釋

一：見於學術季刊第五卷第四期「漢賦的研究」，成世光撰。

註 二：正如牟潤孫評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所說的：「淵源既迷，後事遂成皮相」，「其不能深入，勢成必然。」所以探溯源流是本文用力較深的部分，也是創獲之所在。

註 三：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一一六頁至一一七頁，亦引此段，

謂其愛玩而輕賤的態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辭賦觀念。

註 四：本文所謂的遊戲意義，不是在作者遊戲人間的輕薄態度，而是將它視為酒足飯飽之後，娛悅耳目的消遣品。

註 五：漢惠帝諱盈，此文不諱，故有疑其爲僞託。但也可能當時諱而缺筆，入祧廟而復其原，如公孫詭文鹿賦，亦言「丘山」，也

註 六：案初學記一，以此篇爲枚乘所作，但文選曹植應詔詩注，文選雪賦注，文選鮑照斬月城西門解中詩注所引，皆爲公孫乘作，疑初學記傳鈔誤寫。

註 七：初學記二十五，作屏風張設。

註 八：梁孝王世家：「孝王末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可見一斑。而有關梁園，古文苑載有枚乘菟園賦，亦見其豪奢，茲因該文多錯脫，可靠性更有問題，所以未引用。

註 九：鄒陽及枚乘上吳王書，見漢書本傳，羊勝、公孫詭之事，見史記。

記梁孝王世家，褚少孫補記尤詳。

註一〇：禮運：「卜筮瞽侑」注：「侑、四輔也。」正字通：「侑、佐

也，相也。」說文解字段玉裁注：「耕有耦者，取相助也。故

引伸之，凡相助曰耦，侑之義取乎此。周禮官正『以樂侑食』

，鄭曰：「侑猶勸也。」左傳：『王享醴，命晉侯侑』，杜云

：『既饗，又命晉侯助肴以束帛』，以助釋侑。』詩小雅楚茨

：「以妥以侑」，傳：「侑，勸也」，周禮膳夫：「以樂侑食」

，注：「侑猶勸也。」這些勸王之食，爲王之佐，當是以言

語逗笑，爲王取樂的人物。

註一一：史記滑稽列傳，即記載這一類的人物，而齊稷下的列大夫，以

及四公子門下所豢養的人，也有許多屬於這一類型的清客。

註一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賦六月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

，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

註一三：朱熹詩集傳，即以爲淫奔期會之詩，今人釋此多去其「淫奔」

二字。屈萬里先生詩經釋義三十一頁，以爲男女相悅之詩。王

靜芝先生詩經通釋一一頁，說是男女期會之詩。馬持盈詩經

今註今譯六二頁，則云男女戀愛的詩。

註一四：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

臧等，務隆推術，貶道家言，是以賣太后不悅魏其等。」

註一五：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云：「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

卽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繁，賦之末流耳。」

註一六：見於雍錄卷八，論上林賦之所作。

註一七：此爲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本人於博士學位候選人口試時，臺先生爲口試委員所提出，當時尚有高仲華、王夢鷗、成惕軒、潘重規、周何與盧聲伯等諸位老師在場。

註一八：請見拙作「上林賦著作年代之商榷」，刊於大陸雜誌第四十八卷第六期。

註一九：見補標史記評林卷一百十七。

註二〇：此乃相如答盛覽問作賦，見西京雜記。

註二一：這是揚雄法言批評司馬相如的話，見君子篇。

註二二：校獵賦卽羽獵賦，楊慎的話見於丹鉛雜錄卷八。

註二三：西漢之賦，本無序文，文選所錄之賦序，當如王觀國學林所云

：全係史辭。漢書揚雄傳爲子雲自敍風微之作，所以各賦之前

，皆有其自序。然於撰賦奏獻之初，宜無其序，所以王芑孫說

：「自序之作，始於東京。」（讀賦卮言序例）

註二四：見於其所著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一二二頁。

註二五：文心雕龍麗辭篇：「自揚、馬、張、蔡，崇尚麗辭，如宋畫吳

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李調元賦話則說：「揚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閒有儻句。」

註二六：與建安七子，及楊修、吳質、繁欽、丁儀、丁廙兄弟等。

主要引用書目

楚辭後語 朱熹撰 古逸叢書本 藝文印書館印行

丹鉛雜錄 楊慎撰 函海本 藝文印書館印行

十三經注疏 藝文印書館印行

莊子 莊周撰 郭慶藩集釋 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韓非子 韓非撰 陳奇猷集釋 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荀子 荀況撰 王先謙集解 藝文印書館印行

史記 司馬遷撰 三家注 藝文印書館印行

漢書 班固撰 顏師古注 藝文印書館印行

楚辭章句 王逸章句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文選 蕭統選 唐六臣注 四部叢刊本

法言 揚雄撰 周祖謨校箋 鼎文書局印行

西京雜記 抱經堂叢書本 藝文印書館印行

文心雕龍 劉勰撰 明倫出版社印行

附註：本文與卅六期所載「漢賦璋字源流考」，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六十七學年度之研究獎助。本文投搞於申請獎助之前（申請時已註明），

刊布於獎助公布之後，謹此聲明，並誌謝忱，

文史通義 章學誠撰 商務印書館印行

義門讀書記 何焯撰 石香齋藏版線裝本

齊詩遺說考 陳喬樅撰 皇清經解本

魯詩遺說考 陳喬樅撰 皇清經解本

韓詩遺說考 陳喬樅撰 皇清經解本

論文雜記 劉師培撰 遺書本 京華書局印行

國故論衡 章炳麟撰 廣文書局印行

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撰 商務印書館印行

辭賦起源 萬曼撰 國文月刊五十九期

從士大夫文學到貴遊文學 王師夢鵠撰 文季第一期

國史大綱 錢穆撰 商務印書館印行